

《汉学研究学刊》第二卷（2011）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No. 2 (2011), pp. 280-288

书评

杜维明、池田大作著《对话的文明——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集》（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ISBN：978-962-07-6388-5（精装），254页。

苏庆华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对话”是立足于“人”这一共同的大地，不断开辟理解和信赖的“共生”大道。

——（池田大作·序一）

《对话的文明》不是即兴谈话的记录，也不是关于“对话的文明”的学术专著，而是经过池田大作先生深思熟虑后，精心策划，提出一些关于个人、佛学、儒学、中日美三国关系及地球生存条件的困境等问题，我用英文，他用日文，分别论述的（对谈集）。

——（杜维明·序二）

杜维明和池田大作，都是当今的名士。前者为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是试图在现代复兴儒家人本主义精神的行动型学者”（池田语）；后者乃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长期以来不断与世界国有识之士对话，出版了多部对谈之著作。光凭两位作者本身的名气和成就，这本书的份量已不言而喻。再加上两位作者都是文明对话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对谈的内容也就更值得我们关注了。

翻开这本印刷精美的中译本《对话的文明——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集》，我们从两位《对谈集》作者的序文中清楚看出著作和出版此书之宗旨。借用杜维明自己的话：也许通过“对话”不能解决社会腐败、道德沦丧；也许通过“对话”不能理解他人，也不能认识自己。但是我们（按：指本书两位作者）还是主张“对话”。因为“对话”不仅是人的基本交流形式，是天性，而且也是文明的起源。杜氏因此主张：“对话的心态应该是，容忍—尊重—参照—学习，直到庆幸差异，尤其与极端对立的人相互对话，才能体会到‘没有高山，也就没有平地’，少一样，都不好”。

池田则以宗教家的视角指出：“‘对话’是从精神上熏陶众人生命中蕴藏的善的力量，自己与他人共同提高对和平与幸福的追求的‘和谐’王道”。杜氏亦认为：“对话的文明”并不停留于承认相互差异、互相理解的消极宽容；而是要创造出互相尊敬差异、互相学习，以真正的对话精神为根本的新的地球文明。

基于上述观点的认同、心态和对话精神，二人展开了（连载于《第三文明》杂志）长达一年半的笔谈，内容包括：个人（第一章：人生的道路，学问的道路）、佛学、儒学（第二章：超越文明的差异，及第三章：儒家复兴与佛教人本主义），及中日美三国关系（第四章：21世纪的亚洲与美国）等问题。

上述马拉松式的对谈中，重点提及了双方感兴趣且极力促

成的《地球宪章》，旨在制定并普及“全世界的人们克服环境破坏、贫困、纷争和经济上不平等，争取人类共生的新的行动规范”，并“就其理论的和现实的各种问题，不断地进行了对话”。

虽然“宗教往往与对立及纷争的主要原因牵扯在一起”，但“也不应一概否定宗教的价值”。池田指出：“现代是社会人们心冷的时代，尤其是青年，心冷得很严重。这种‘心冷’产生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杜氏认为：“今天对宗教的要求，就是要让它发挥“温暖、点燃、复苏这颗冷透了的人心”这样的作用。（页90-91）就此问题上，对谈人双方都认同：“宗教在21世纪要承担极其重要的职责”。（页93）作为地球公民一员的宗教领袖，当能“将其精神的源泉运用于为全人类造福上，努力帮助我们关于人类所处现状的认识和理解”。（页65-66）

谈到宗教间对话的意义时，双方也同时点出其中的困难和隐忧，即：“担心对话的场所被利用当作始终自我宣传或把对方拉进自己决斗场地的手段”。（页97）杜氏认为：“真正的思想家、真正的宗教领袖，不是陷入教义的论争，而是为了新的思考方法和行动方式打破既成的壁垒而存在的”。（故此）“国粹主义、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和攻击性的胜他主义的问题，一定要彻底地进行分析 and 查证”。杜氏认同池田所强调的：在世界上推广对话的目的，在于创造出新的“理解的道德氛围”。特别是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增进相互理解，可以说是东南亚信奉佛教和儒家的人们应当致力的紧急课题”。（页98-99）

本书第二章第五节“向新的‘文化对话主义’前进”中，池田提出：“今后的时代，应当在国际社会中运用‘大同思想’的精神”。（页118）杜维明补充道：“大同思想并不要求划一性。它是一种既利用多样性又使其统一的智慧”。这种“不需一律化的和谐”的思想，“是基于生命世界中的共同经验”。（页

119-120) 杜氏进一步阐明：“所谓‘和谐’，不外是各种因素在共存的活力中，互相增强，互相提高，同时互相起作用，极其复杂地达到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页124) 池田亦认为：“真正的‘和谐’不是由什么人创造出来的，每个人的‘自发性’和‘能动性’是不可缺少的。(页126) 他于本章总结时指出：只是单纯承认各种文化的存在和并存，不可能从世界上消除只把自己集团看做是绝对的闭塞的‘排他主义’。为此，我们(应)朝着以开放的自发的交流为宗旨的“文化对话主义”新阶段前进。

展望21世纪，“全球一体化”是个不可避免的课题。能不能把这个全球一体化导向全人类的和平与繁荣的方向？曾经和池田交谈过的许多世界有识之士都强调：“与其说全球一体化会带来文化的均质性，毋宁说会突现出‘文化的多样性’”。然而，杜氏却提醒地说：全球一体化“往往会作为其反动，产生‘地区主义化’”。¹

另一方面，“‘地球村’(global village) 概念的出现，要求我们深入探讨人类应当共同具有的‘核心价值观’”。(页131-132) 杜氏引述孔子“和而不同”的说法，认为：“它很好地表现了‘在多样性中的统一’的理想状态”。(页134)

诚然，‘对话的文明’推进了活用多样性的‘精神的全球化’。杜氏乐观地认为：“通过‘文化交流’、‘人本主义教育’和‘开发的对话’，可超越对私利的追求”。具有‘地球村’一员的团结意识，是和平与人的安全保障的第一步。(页

1 杜氏认为：“本民族中心主义，好战的排外主义的国家主义以及文化帝国主义、领土扩张主义、原教旨主义等活动，反而会越来越耀武扬威，在很多场合已成为一种威胁”。【参引自杜维明、池田大作著《对话的文明》，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页131。】

140) 池田则进一步阐明：“发挥和增强关爱他人的人的本性之心，一定会成为‘精神全球一体化’的核心”，² 并且以为：“文化交流’和‘人本主义教育’都应该把重点放在这里。（页141）

本书第三章“儒家复兴与佛教人本主义”中，池田指出：“‘儒家人本主义’与‘佛教人本主义’（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理念是相通的。（页146）在主张‘为人之道’这一点上，杜氏认为：儒家所说的‘天人合一’，正基于为发挥人的善性、超越一切基础的‘天’的概念。其本质应当是‘立足于宇宙视野的人学’。（页150）池田亦把‘佛教人本主义’称为‘宇宙的人本主义’，以其“在人的生命深层发现了‘内在的宇宙’，洞察到贯穿于宇宙和生命的绝妙律动是宇宙根本之‘法’（dharma）”。对他而言，“‘佛教人本主义’也与‘儒家人本主义’一样，开拓了远远超过人类中心主义和简单人学的‘宇宙论的人学’的地平面”。（页151）

针对池田提出的：“‘儒家人本主义’今后应发挥怎样的作用？”之问题，杜氏回应道：儒家可通过与世界宗教对话，应对现代世界紧迫的课题，成为人类共同体的活跃精神源泉。另外，儒家还必须积极参与制定从多种角度讨论人类状况的课题。池田则希望佛教人本主义与儒家人本主义不断对话，增强对遵循儒家所说的‘天’、佛教所说的‘宇宙根本之法’的人的生活态度和社会的贡献。（页157）池田更把儒家的“仁”强调为“软实力”（soft power）的力量。杜氏补充道：“没有现实社会中的人

2 他引述思想家西蒙奈·贝依（1909-1943）的话：“受难，痛心的感情，可以轻易地越过国界，传到各个不幸的国家，毫无例外地扩大到一切国家”，并以此等同于佛法中“以他人之苦为自己之苦的‘同苦’的人生态度。【参引自杜维明、池田大作著《对话的文明》，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页141。】

际关系、对话和交流，就不可能有‘仁’。通过对话，‘仁’可以克服只图个人安宁的狭小度量；通过‘交流’，‘仁’会拥有生气勃勃的变革力量。（页177，179）杜氏坚决地指出：“人是不可能通过激烈的论争和不正常的竞争而变得文明的”。而池田更提倡：“要从每个人的身边开始，勇敢地把相互磨炼、互相提供‘慈悲’与‘智慧’的‘对话’和‘交流’推广开来。（因为）这种顽强的宝贵精神斗争，正是创造新文明的原动力。（页186）

谈到儒家的‘礼’，杜维明认为：“它远远超过祭坛上礼拜的层面，而是包括从生到死的人的存在各个层面上文明化的生活礼节”。更进一步说，“所谓‘礼’，是指成为社会人际关系中一切恰当的行为举止的基本礼仪”。（页207）池田指出：“释尊生活时代的印度，共同体的仪礼和习俗已经僵化。释尊对此进行了批判，主张‘诸行无常’，即‘各种仪礼和习俗都会逐渐变化’，把人们从‘束缚人的仪礼’中解放了出来”。（页207-208）杜氏结合了二者，作出：“佛教和儒家中都流动着扎根于人本主义的深刻精神性、伦理性 and 宗教性，（故而）在两者之间相遇对话时，它会成为基于信赖的社会中真正表达意图的精神气质”之论断。（页208-209）

池田提出了：“（大乘）佛法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变革现实，为了实现和平与幸福”之观点。杜维明回应道：“佛教和儒家均洞察到超越自我中心的能力是人性开花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而且两者都呼吁，不‘拯救’作为整体的人类，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地实现各个个人的自我”。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不论佛教徒还是儒家，产生出‘非宗派的宗教精神’显然是很重要的”。可是，世界上很多既成的宗教团体并没有认真理解这一观点。可以说，这是导致宗教间对立的一个主要原因。（页212）

池田据《法华经》‘地涌菩萨’的‘心无所畏’句，指陈其“怀着宇宙生命内含的‘慈悲’、‘智慧’和‘勇气’来打

破民众的苦恼”。（页216）对谈人杜氏赞誉此‘菩萨精神’为“（给）世界带来融洽与和谐的卓越人格的楷模”，并以此比拟为“有着一种‘中道’的人生方式”。³

池田则以佛教的‘中道’⁴比拟“儒家的‘中庸’（思想），要开辟顺天道、存天命的有价值的人生——怀着‘仁’心、恪守礼节的人生方式。（页217）他补充道：‘中道’的智慧是宇宙生命所具有的本源的智慧，所以它充满了巨大的慈悲的活力。而且能在共同分担和超越众生的苦恼的过程中，促进所有的人们实现伟大的‘人性开花’”。⁵

第四章“21世纪的亚洲与美国”、第二节“争取‘对话的文明’”中，对谈人双方都谈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池田认为：“这条‘改革开放’路线，是人类史上一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 这里面有着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一脉相通扬弃合一的思考方法，把看起来互不相容的东西⁶包容进现实社会的运营之中，通过实践使其升华为最好的方法。[...] 这种灵活的人本主义设想，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
- 3 杜氏强调：“‘中道’绝不是‘走道的中间’的折衷主义”，并认为：这种‘中道’精神，可以把‘实现自我’与‘为社会服务’这两种看起来似乎不同的人生方式融合到一起。【参引自杜维明、池田大作著《对话的文明》，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页217，219。】
- 4 池田认为：此‘中道’的人生方式，不受现已的意识形态、国家、阶级等框架的束缚而偏向一方，而是在变化多端的现实之中，一面与这种现实紧密结合，同时为自己和他们的幸福以及和平，争取创造最大的价值。【参引自杜维明、池田大作著前揭书，2008年，页217-218。】
- 5 池田坚信“这种（凭藉善的活力）坚持不懈的对话和实践，一定会产生伟大的社会变革力量”。【参引自杜维明、池田大作著前揭书，2008年，页219。】
- 6 这里乃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

杜维明认同池田的看法，但指出：“中国经济虽说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还处于发展阶段，距离实现‘小康社会’的路程还很漫长且艰巨。[...]中国还必须解决‘自由’、‘平等’以及‘选择的自由’与‘公正’的矛盾问题。⁷

在“从‘教文明’到‘学文明’”章节中，杜维明指出：展望21世纪之际，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希望“具有开发精神和自我批评及反省能力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同时希望美国也能向亚洲的文化学习”。他殷切地希望美国能从过去一直不断地向世界输送各个文化领域的知识和价值观（即所谓‘教文明’）的立场；今后要学会采用‘学文明’的态度。（页249）

池田认同杜氏上述‘学文明’的观点，并认为“这里有着‘对话的文明’的实质内容”。他强调“‘对话的文明’绝不是远在天边，而是向身边的邻居或邻国的人民敞开心扉，面对面。即使思考方式不同，也要予以尊重，诚恳地倾耳倾听，坚持不懈地交谈。而且要共同摸索创造价值的道路，共同前进”。（页252）池田确信：“在这种‘对话的文明’的丰饶大地上，谦虚地学习人类的多样性，追求人类普遍的伦理，肯定会盛开出美丽的‘和平文化’的花朵”。杜氏希望两人的对谈成果将会成为‘对话的文明’的一个参考。

在对谈结束之际，杜维明自认“荣幸地获得了这样与池田（SGI）会长进行长时间持续对话的宝贵机会”。杜氏赞誉池田“是现代世界上最熟练的对话高手，在长达半个世纪里通过具备‘仔细听取对方谈话’这一技巧的对话，一直作为促进世界和平

7 例如：让具备世界知识、具有发展国家坚强意志的公共知识分子，承担着扩大‘公’的领域、使掌握权力的人们参与交流沟通和意见交换领域的重任。【参引自杜维明、池田大作著前掲书，2008年，页246。】

的斗士在活动。通过与世界各地许多有识之士的会见与对话，大大地扩大了智慧的水平，给现代许多思想家带来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与反省的机会”。池田谦虚地回应道：“今后（自己）仍要与杜博士等世界有识之士一起，为创造‘对话的文明’和构筑‘和平的世纪’，进一步继续行动”。

通读《对话的文明》这部整理自两位世界级对话高手之《对谈集》，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亦使笔者对两位作者共同为早日实现“创造出互相尊敬差异、互相学习，以真正的对话精神为根本的新的地球文明”所作出的一切努力肃然起敬，并且向他们表达发自内心的由衷感激！诚如杜维明于序中指出：“这不是即兴对话的记录；也不是关于‘对话的文明’的学术专著”。但毫无疑问，它确实是一部充满智慧之光、振聋发聩，且对“世界通向和平友好道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重要著作。拜览之余，笔者慎重地向大家推介这本极具阅读和收藏价值的好书。

2011年06月02日修订三稿